

為什麼 文化 很重要

CULTURE MATTERS
How Values Shape Human Progress

福山·杭廷頓·波特·裴魯恂·杜維明等著名學者討論文化如何影響人類的進展

哈瑞森(L.E. Harrison)&杭廷頓(S.P. Huntington)◆編著

李振昌·林慈淑◆譯

全球視野 ④

爲什麼文化很重要

CULTURE MATTERS
—How Values Shape Human Progress

哈瑞森 (Lawrence E. Harrison)

杭廷頓 (Samuel P. Huntington)

編著

李振昌 · 林慈淑 © 譯

爲什麼文化很重要

2003年4月初版

有著作權·翻印必究

Printed in Taiwan.

定價：新臺幣380元

編 著 哈 瑞 森
杭 廷 頓
譯 者 李 振 昌
林 淑 慈
發 行 人 劉 國 瑞

責任編輯 莊 惠 薰
校 對 李 國 維
封面設計 莊 祐 銘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
台北發行所地址：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

電話：(02)26418661

台北忠孝門市地址：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1-2樓

電話：(02)27683708

台北新生門市地址：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

電話：(02)23620308

台中門市地址：台中市健行路321號

台中分公司電話：(04)22312023

高雄辦事處地址：高雄市成功一路363號B1

電話：(07)2412802

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-3號

郵撥電話：26418662

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

本書如有缺頁，破損，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。

ISBN 957-08-2573-1 (平裝)

聯經網址 <http://www.udngroup.com.tw/linkingp>

信箱 e-mail: linkingp@ms9.hinet.net

CULTURE MATTERS

Copyright © 2000 by Lawrence E. Harrison and Samuel P. Huntington

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03 by Linking Publishing Company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sic Books, a subsidiary of Perseus Books L.L.C.

Through Bardou-Chinese Media Agency.

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序

文化有重要意義

杭廷頓(Samuel P. Huntington)

1990年代初期，我碰巧看到迦納與南韓1960年代初期的一些經濟資料，令我十分震驚。當時迦納與南韓的經濟狀況非常相似，國民所得差不多，幾乎都是以原料出口為主，只是南韓有一些製造業產品。這兩個國家也都接受相同程度的經濟援助。三十年後，南韓成爲工業大國，是全世界第十四大經濟體，擁有跨國性企業，是汽車、電子設備與其他製造業產品的主要出口國家，國民平均所得接近希臘。更重要的是，民主制度日益鞏固。迦納卻還是一樣，現在的國民所得只有南韓的十五分之一。這種懸殊的差異應該如何解釋呢？這當然有許多因素，不過我認爲文化是很重要的因素。南韓重視節儉、投資、努力工作、教育、組織與紀律；而迦納的價值觀卻不一樣。換句話說，文化的影響很大。

1990年代初期，其他學者也得出一樣的結論。社會學家重新對文化有興趣，這是主要的研究成果之一。1940與1950年代，許多人開始注意文化，認爲是了解社會、分析差異，以及解釋

的重要因素。其中包括米德(Margaret Mead)、班乃迪克(Ruth Benedict)、麥克蘭(David McClelland)、班菲爾德(Edward Banfield)、英克雷斯(Alex Inkeles)、阿蒙(Gabriel Almond)、佛巴(Sidney Verba)、裴魯恂(Lucian Pye)、李普塞特(Seymour Martin Lipset)。這些學者提出豐富的研究報告，不過學術界對於文化的研究，卻在1960與1970年代突然銷聲匿跡。到了1980年代，又開始以文化來解釋社會現象。文化重新引起興趣，主要是因為美國國際開發援助署(USAID)前任官員哈瑞森所著的一本書《未開發是一種心態》(*Underdevelopment Is a State of Mind: The Latin American Case*)，1985年由哈佛國際事務中心所出版。哈瑞森(Lawrence Harrison)以案例比較研究方法，顯示大部分拉丁美洲國家的文化，是經濟發展主要的障礙。他的分析引起經濟學家、拉丁美洲專家，以及拉丁美洲知識分子的抗議。不過幾年之後，這些領域的人開始發現這個說法有幾分可信。

社會學家開始以文化因素來解釋現代化、政治民主化、戰略、種族行為模式，以及國家之間的結盟與敵對關係。本書所選輯的作者，對於文化重新獲得重視都有很大的貢獻。1996年12月所出版的《經濟學人》(*Economist*)有一篇文章對於以文化來解釋提出批評與懷疑，所批判的學者包括福山(Francis Fukuyama)、哈瑞森、柯普蘭(Robert Kaplan)、李普塞特、普特南(Robert Putman)、索威爾(Thomas Sowell)，以及我本人。後來有些學者也加入學術界這場論戰，他們認為文化是社會、政治與經濟行為的重要因素，不過不是唯一的因素。還有一些學者以普遍性來解釋，像是認為經濟活動以追求私利為主的經濟學家、認為「理性決策」的政治學家，以及新現實主義的國際

關係學者，也都加入這場論戰。讀者可以發現，本書包括各家的不同見解。

摩尼漢(Daniel Patrick Moynihan)有段話，對於文化的見解相當精闢：「保守派所信仰的真理，認為一個社會成功的決定因素，是以文化為中心，而不是政治。自由派所信仰的真理，認為政治可以改變文化，並且拯救這個文化本身。」在哈瑞森的主導之下，哈佛國際暨亞洲研究中心探討摩尼漢的兩個真理，本書就是研究的成果之一。文化因素影響經濟與政治發展，究竟到什麼樣的程度？如果真有影響，要如何改變文化，不要成為發展的障礙，而是有助於進步？

為了妥善處理這些問題，首先要將名詞定義清楚。「人類進步」是指經濟發展物質富裕、社會經濟平等與政治民主。「文化」在不同的領域裡有不同的意義，通常用來指社會的知識、音樂、藝術與文學，亦即所謂「高等文化」。著名的人類學家紀爾茲(Clifford Geertz)曾經強調文化是「濃厚的形容」(thick description)，並且用文化來描述社會整個生活方式，包括價值觀、習俗、象徵、制度與人際關係。不過，本書主要是探討文化如何影響經濟發展，如果文化包括所有一切，就無法解釋任何意義。因此我們以純粹主觀來定義文化，指的是價值觀、態度、信仰、傾向，以及整個社會普遍的觀念。

本書探討文化如何影響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化，因此大多數的研究報告將文化視為自變項。不過，如果文化因素真的影響人類進步，有時候造成進步的障礙，我們也將文化視為依變項。這就是摩尼漢第二個真理：政治或是其他行動，如何改變或是消除妨礙進步的文化障礙？我們知道經濟發展能夠改變文

化，但是如果我們的目標是消除妨礙進步的文化障礙，這個真理沒有什麼幫助。爲了因應巨變，社會可能改變文化。第二次世界大戰慘痛的經驗改變德國與日本，從兩個軍事強權變成兩個最愛好和平的國家。葛隆多那(Mariano Grondona)也認爲，1990年代中期，阿根廷之所以進行經濟改革，促進經濟穩定與政治民主化，有部分原因是因爲過去軍事獨裁、戰爭失利以及嚴重通貨膨脹帶來的痛苦經驗。

因此，關鍵在於政治領導人能否刺激文化的改變，最好的例子就是新加坡的領導人。本書第九章由李普塞特與林茲(G. S. Lenz)合寫，他們強調，貪瀆腐敗的程度跟文化有很密切的關係。印尼、俄羅斯，以及拉丁美洲與非洲幾個國家，腐敗程度最嚴重。北歐與英國移民建立的新教徒國家，腐敗程度最低。儒家文化國家大多數是中等腐敗，不過新加坡排名比丹麥、瑞典、芬蘭、紐西蘭還高，是全世界最清廉的國家之一。這顯然是李光耀的功勞，他以政治力量改變文化，並拯救這個國家。不過，問題是李光耀之後的新加坡能否維持清廉。政治能夠永遠拯救這個社會嗎？政治與社會的力量能夠讓文化更進步嗎？這是我們要進一步探討的重要問題。

哈瑞森主要的努力成果，就是「文化價值觀與人類進步」專案計畫以及這本書。這個計畫是他的構想，他找出需要探討的議題，邀請專家學者參加專題討論小組，將提出的報告編輯成書，並且籌募資金。哈佛大學國際與地區研究所很高興能夠參與並贊助這項計畫，因爲這跟研究所的努力方向有直接的關係。從1986年起，研究所就提供兩年的研究獎學金給年輕的社會學家，申請者必須對於非西方國家或地區的語言、文化、社

會、制度與政治有深入了解，並且能夠與專業學術相結合。研究所的校友現在執教於全美各大院校。研究所的工作由哈佛大學資深教授組成委員會監督，他們都是對於特定外國領域學有專精的一流專家。三年前，研究所將國外問題專家進行整合，從個別社會與文化的研究，擴展到世界各主要文化與文明之間的異同比較與互動。1997年召開的會議，探討世界主要國家政治菁英的觀點與傾向，以及美好世界秩序的特質。本書是第二個成果，比較不同的文化如何影響經濟與政治發展。

1992年科里特嘉(Robert Klitgaard)進行一項研究，針對文化與經濟發展的關係，他提出一個問題：如果文化很重要，而且對於文化的研究已經有一個世紀，為什麼提不出很好的理論與實際可行的指導原則？研究文化與決定經濟發展政策的人，為什麼無法將專業知識結合在一起？我們希望本書的主要目的是發展出理論，擬出一套指導原則，並且培養學者與官員之間的聯繫，促使文化發展與人類進步。

前言

為什麼文化很重要

羅倫斯·哈瑞森(Lawrence E. Harrison)

二次世界大戰之後，至今已經有半世紀，全世界忙著重建家園，非洲、亞洲與拉丁美洲大多數人也逐漸擺脫貧窮、無知與沒有法治正義的生活。樂觀主義者對於馬歇爾計畫重建西歐以及日本能夠從廢墟中站起來，感到非常欣慰。經濟的發展曾經被認為是無可避免的，尤其是在殖民統治的束縛消失之後。1960年，羅斯托(Walt Rostow)出版《經濟成長階段論》(*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*)，這是一本很有影響力的書，他認為透過辯證，可以加速人類的發展進步。

殖民統治的束縛已經消失。菲律賓於1946年獨立，印度與巴基斯坦於1947年獨立。英國與法國在中東託管鄂圖曼帝國的土地，戰後也紛紛獨立。1960年代末期，東南亞、非洲與加勒比海，基本上已經完全脫離殖民統治。

甘迺迪總統認為解決古巴革命的問題，就是將古巴納入進步的聯盟。這充分代表當時的樂觀主義，認為將馬歇爾計畫的成功予以複製，拉丁美洲在十年內就可以繁榮民主。

但是，進入新的世紀，樂觀主義已經被挫折與悲觀主義所取代。少數國家，像是西班牙、葡萄牙、南韓、台灣與新加坡，以及前英國殖民地的香港，已經按照羅斯托的軌道進入第一世界。但是，大部分的國家還是遠遠落後，這些國家有許多人口物質缺乏，跟半世紀之前比較，沒有任何改善。今天全世界有60億人口，生活在民主先進的國家，卻不到10億人。40多億人生活在世界銀行歸類為「低收入」與「中低收入」的國家。

這些國家的生活品質堪慮，尤其是經過半世紀以來的經濟援助之後，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¹：

- ▶ 有23個國家，成年人有一半以上是文盲，這些國家大多是在非洲。非洲以外的國家，包括阿富汗、孟加拉、尼泊爾、巴基斯坦，甚至還有一個是西半球的國家——海地。
- ▶ 有35個國家，婦女有一半以上是文盲。其中包括阿爾及利亞、埃及、瓜地馬拉、印度、寮國、摩洛哥、奈及利亞與沙烏地阿拉伯。
- ▶ 有45個國家，國民預期壽命低於60歲。大多數是在非洲，不過也包括阿富汗、柬埔寨、海地、寮國與巴布亞新幾內亞。有18個國家，國民預期壽命低於50歲，全部在非洲。獅子山國的人民預期壽命只有37歲。
- ▶ 至少有35個國家，5歲以下的兒童夭折率超過100%，大

1 資料來自世界銀行*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8/99*的“Selected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”(New York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99)。

多數在非洲。其他不是非洲國家，包括孟加拉、玻利維亞、海地、尼泊爾、巴基斯坦與葉門。

- ▶ 最貧窮國家的人口成長率每年是2.1%，是高收入國家的三倍。有些伊斯蘭國家的人口成長率相當高：阿曼是5%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是4.9%，約旦是4.8%，沙烏地阿拉伯與土庫曼是3.4%。

根據各國提供給世界銀行的資料(不是每個國家都提供資料)，最懸殊的收入分配，出現在較貧窮的國家，尤其是拉丁美洲與非洲。巴西最富裕的前10%人口，擁有48%的收入。肯亞、南非與辛巴威次之，前10%的人口，擁有47%的收入。智利、哥倫比亞、瓜地馬拉與巴拉圭，前10%的人口，擁有46%的收入。非洲幾內亞比索共和國、塞內加爾與獅子山，則是43%。至於民主先進國家財富分配最懸殊的美國，前10%的人口，擁有28.5%的收入。

在非洲以及中東與亞洲其他地區的回教國家，民主制度很脆弱，或者根本沒有民主。過去15年來，拉丁美洲的民主很有進步，不過從秘魯、巴拉圭、厄瓜多爾、委內瑞拉、哥倫比亞與墨西哥，最近所發生的事件來看，民主的實驗還很脆弱。這留下一個沉重的問題：為什麼拉丁美洲獨立已經150多年，還是無法建立穩固的民主制度？何況拉丁美洲還是西方世界的延伸。

總而言之，20世紀末的世界更加貧窮，也更加不公平，而且比中世紀大多數人生活在更獨裁專制的統治之下。

美國有許多人還是為貧困所苦，經過數十年與貧窮戰鬥，

如今西班牙後裔有30%生活在貧困中，取代黑人成為窮人中的大多數。在一些印地安保留區，失業率高達70%。黑人的進步令人深刻印象，尤其是黑人女性。不過，儘管美國已經連續10年，享有高經濟成長與低失業率，還是有27%的黑人生活貧苦。

樂觀主義者在國內外與貧窮戰鬥，結果還是白忙一場，甚至變成悲觀主義者。

失敗原因：殖民政策、依賴成性、種族歧視

未開發國家的經濟問題相當棘手，超乎已開發國家的專家所預期。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提出兩個解釋：殖民政策與依賴成性。在窮國的大學與政治圈，以及富國的大學裡，這兩個解釋風靡一時。列寧認為資本主義發展到最後，為了替國內的產品與資本找尋市場，無可避免會走上帝國主義的階段。

對於那些脫離英國、法國、荷蘭、葡萄牙、美國與日本等殖民統治，才剛獨立的前殖民地、佔領地與託管地國家而言，帝國主義對於國民心理確實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，也是經濟落後最好的解釋。非洲的國界通常是殖民政權主觀劃分，根本沒有考慮文化的同質性，或是部落的融合等問題，這更是殖民留下的麻煩。

在所謂「第三世界」中，有些國家已經獨立一個世紀以上，像是拉丁美洲國家，資本主義讓他們變得「依賴」。這個理論認為，貧窮國家向富有的資本主義國家舉債，資本主義國家壓低基本原料物資的世界市場價格，卻提高所製造產品的價格，窮國無力還債，只好賴帳。富國的跨國企業賺取的利潤，是相對

剝削窮國得來的。

不論是殖民主義或是依賴理論，在今天都沒有可信度可言。對許多人來說，包括一些非洲人，殖民主義已經不再是造成經濟落後的原因。何況有四個殖民地，香港與新加坡是前英國殖民地，南韓與台灣是前日本殖民地，都已經進入第一世界。今天已經很少人提到依賴，而幾年前美國大學還一致認為這是正確的。這原因包括：東歐共產國家的瓦解；中共逐漸改用傳統的自由市場經濟；蘇聯停止提供援助，古巴經濟就崩潰；東亞四小龍在世界市場上的成功；1990年尼加拉瓜選舉，桑定政權慘敗；墨西哥提議加入加拿大與美國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。〔關於依賴理論，請詳見第1章藍迪斯的論述〕

過去10年的演變，沒有人提出適當的解釋。多年來，經濟開發協助機構提出各式各樣的解答，包括土地改革、社區發展、計畫經濟、專注在最貧窮的人、人類基本生活需求、適當的技術、女性在經濟開發的角色、民營化、地方分權，現在又提出「永續發展」。1970年代，還有一項創新手法，經濟開發機構引進人類學者，希望經濟計畫更適合現有的文化。所有這些創意手法，多少都有其效用，更別提自由市場經濟與政治多元論的功效。但是在第三世界，無論個別國家或整體，都沒有出現普遍的快速經濟成長，也沒有出現民主與社會正義。

20世紀中葉，美國黑人的經濟落後是可以理解的。主要是黑人缺乏機會，無論是教育、工作、政治各方面，少數民族都沒有真正融入美國這民族大熔爐，權利法案沒有落實到少數民族。過去50年，在許多層面產生種族革命，不只是打破各種藩籬，提供機會，也改變白人對種族的態度。這場革命使得許多

黑人成爲中產階級，大幅消除黑白之間的教育隔閡，許多黑人進入政壇，通婚也逐漸增加。不過在高等教育、收入、財富上，種族之間還是有很大的差距。有27%的黑人生活貧窮，大多數的黑人小孩是單身母親所生，貧民區的問題還是很嚴重。

50年後，雖然種族歧視還是繼續存在，但是已經不足以解釋黑人在經濟上的落後。尤其是西班牙後裔的經濟弱勢，現在成爲更嚴重的問題。有30%的西裔是窮人，西裔高中生的休學率也是30%，比黑人高出一倍。西裔移民雖然受到歧視，但是一定不會比黑人更受到歧視。甚至還不如中國與日本的移民所受的歧視，而中國與日本的後裔，在教育、收入與財富上，都遠超出全美國的平均值。拉丁後裔的美國人，幾乎有一半是窮人，高中生休學率更是高達70%²。

文化的模式：哈佛大學學術研討會

國際上的貧窮與威權主義，無法以殖民主義與依賴論來解釋(美國國內少數民族的貧窮，也無法以種族歧視來解釋)，地理與氣候同樣也無法解釋，因爲有太多的例外(像是位處熱帶的新加坡、香港、巴貝多與哥斯大黎加)。過去半世紀以來，有些國家在經濟繁榮與政治多元化的進展，表現得不盡滿意，到底

2 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經濟委員會1993年所出版的*Social Panorama of Latin America*指出，「郊區居民有五分之二是貧民，都市居民的貧民比率更高達五分之三」(p. 35)。這表示1990年拉丁美洲有46%的人口是生活在貧窮以下，22%在赤貧以下。中學生70%的輟學率，是從世界銀行*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7*圖表7估計得出。

這要如何解釋呢？

越來越多學者、新聞工作人員、政治家與經濟發展專家，認為文化價值觀與態度，是造成進步的因素或阻力。他們都是托克維爾(Alexis de Tocqueville)的傳人，托克維爾認為美國政治制度能發揮功效，是因為文化與民主協調一致。韋伯(Max Weber)認為資本主義的興起，基本上是植根於宗教的文化現象。班菲爾德(Edward Banfield)說明南義大利的貧窮與獨裁主義，有其文化上的根源，這個例子經常被引用。

文化研究與強調社會科學中的文化，成為1940與1950年代的主流。後來對於文化的興趣變弱，但是過去15年，又開始對於文化研究感興趣，重新思考文化對於經濟發展與人權進步的影響。

1998年夏天，哈佛大學國際與區域研究所決定探討文化與政治、經濟、社會發展之間的關係，主要是針對貧窮國家，但也探討美國少數民族的貧窮問題。有這麼多學者開始對文化研究又感到興趣，實在可喜可賀。這個研討會定名為「文化價值與人類進步」，1999年4月23-25日於麻省劍橋市美國文理研究所召開，許多著名學者專家參與盛會。

研討會架構與參加學者

研討會分成八個專題討論小組，前兩天每天四個小組報告，最後是半天的綜合報告。

第一個專題討論小組由哈佛大學的多明克(Jorge Dominguez)主持，探討政治發展與文化的關係。英格哈特(Ronald Inglehart)

負責「世界價值觀調查」，認為文化價值觀與各國政治與經濟的表現，有很大的關係。福山討論社會資本在促進民主制度上所扮演的角色，李普塞特則是研究文化與貪污之間的關係。

美國創業機構總裁德穆斯(Christopher DeMuth)主持前兩個小組，討論文化與經濟發展。藍迪斯在《新國富論》(*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*)中，提出的結論是「文化造成一切差異」³。波特(Michael Porter)認為文化影響經濟與競爭力，但是他強調，全球化與文化交流將使得文化同質化，各國更容易克服文化與地理上的劣勢。沙克斯(Jeffrey Sachs)的觀點是，跟地理與氣候相比，文化的因素不是很明顯。

第二小組討論文化與經濟發展，由美國國際發展局副局長貝比特(Harriet Babbitt)主持，葛隆多那(Mariano Grondona)提出協助與阻礙經濟發展的各種文化類型的學說，這主要是他研究妨礙阿根廷進步因素所得出的結果。蒙塔那(Carlos Alberto Montaner)解釋拉丁美洲的文化如何影響菁英分子的行為，並對社會造成傷害。艾通嘉－曼谷利(Daniel Etounga-Manguelle)討論非洲文化對於經濟發展與競爭力所造成的阻礙。

第一天最後一個小組，是由哈佛大學的嘉納(Howard Gardner)主持，共有三位人類學家報告。艾佳頓(Robert Edgerton)認為有些文化比其他文化對人類較好；施偉德(Richard Shweder)說明他自己是文化多元主義者，接受與尊敬所有的文化；衛思納(Thomas Weisner)專研文化的交流傳播，尤其是在孩童時期。

3 David Landes, *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*(New York: Norton, 1998), p. 516.

哈佛大學的麥克法格哈(Roderic MacFarquahar)主持亞洲危機的小組，包括經濟學家柏金斯(Dwight Perkins)、政治科學家裴魯恂，以及漢學家杜維明。柏金斯與裴魯恂的報告都強調，東亞傳統的個人親信關係必須改變，裴魯恂則比較西方化與儒家文化在經濟發展過程的差異。

性別與文化這一小組，是由世界銀行的波美藍茲(Phylliss Pomerantz)所主持，《紐約時報》的克羅西特(Barbara Crossette)率先主講，她的題目是文化相對主義與聯合國人權宣言的衝突。她的結論與施偉德正好是強烈的對比。馬拉赫頓(Mala Htun)討論拉丁美洲性別關係的變遷，以及文化與其他因素對於經濟的障礙。華生(Rubie Watson)主講文化力量造成中國婦女的從屬地位。附帶一提的是，她不願意將報告收錄在本書中，我們感到很遺憾。

前科羅拉多州長藍姆(Richard Lamm)主持文化與美國少數民族的研討小組。由派特森(Orlando Patterson)先主講，他強調文化與少數民族問題的關係，分析奴隸制度的影響，以及婚姻制度與今日美國黑人單身母親比例較高之間的關係。艾斯特拉達(Richard Estrada)由於突然身體不適，無法參加這次研討會^①。哈佛大學的特士瓊(Stephen Thernstrom)提出人口趨勢的報告，葛雷澤(Nathan Glazer)主講的是，以文化分析各種族在政治與情緒問題上的表現。

最後一組是蘭德(RAND)公司的科里特嘉(Robert Klitgaard)所主持，探討如何促進正面的價值觀與態度，這些方法是目前

① 譯註：艾斯特拉達於1999年10月29日過世，享年49歲